

【精神文化】

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

罗永宽 李 燕

【摘要】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程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切入对于中国革命之“红色”叙事缘起及其隐喻的揭示。狭义的红色文化主要喻指红色革命文化,其精神源流上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接近代救亡文化和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五四新文化融会,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贯通,下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在四个紧密依存而又各有侧重的面向: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在于坚定理想信念,增进政治认同,提升文化自信,助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关键词】红色文化;中国革命;精神内核;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罗永宽,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燕,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原文出处】《文化软实力研究》(武汉),2017.1.5~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曾到西柏坡、延安、遵义、沂蒙、井冈山、古田等革命圣地和革命老区考察,指出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构成了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强调要让红色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为了坚定新形势下对于红色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进而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有必要在对中国共产党奋斗发展史整体把握的基础上,辨流考源中国革命的红色隐喻,精微洞烛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核,发掘阐扬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革命的“红色”叙事隐喻

人类创造的文化多源发生、多向发展,实可谓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但是赋予一种特定文化以色彩的隐喻,并在叙事中以“红色”代表其独特的精神标志,昭示其本质内涵的,可能唯有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中

孕育和发展的“红色文化”了。

“红色”和文化的因缘际会,首先源于自古偏爱红色的中国人赋予“红色”的文化意蕴。“中国红”可追溯到古代国人对日神的虔诚膜拜。五行中的火对应的颜色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象征红色,原始人奉红为上色,周朝人尚红,汉高祖自称“赤帝之子”,南北民俗中均有在本命年挂红以镇邪避灾的传统,“中国结”富蕴多重祈福内涵。总之,国人在使用红色标志时,除了它在特殊的电磁波范围内对视觉产生独特的冲击之外,均被赋予象征意义,或喜庆,或吉祥,或庄严,或激昂,或富贵等,其赋义总是与此类语境相关联。

近代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先进的中国人”于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之际,筚路蓝缕,艰辛探索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路,“革命”渐成继“变法”“改良”之后最引人注目、最具冲击力的进步话语,以此为志业的志士仁人以“革命者”自许,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血染大江南北,为近代中国革命涂上一抹鲜艳、壮烈、激越的红色印记。“红色是太阳和火的颜色,庄重、激昂,象征

革命和反叛精神。”^①

世界范围内红色与革命的相伴而行,一般追溯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打出红旗象征“烈士的鲜血”,掌控局势后将红旗作为非正式的国旗,几与法兰西三色旗并尊。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吁请用象征革命的红旗取代三色旗,这一愿望终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得以实现。红色在斯拉夫文化中含有美好寓意,1917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组建红军赤卫队,1923年苏联将红色用作第一面国旗的背景色,主要是向巴黎公社致敬。至此,红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鲜明象征。

20世纪中国的红色文化发轫于十月革命之后,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带有全局意义的武装暴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起义部队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旗帜。同年中共湖南省委在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之际,认真讨论了革命旗帜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白色恐怖的象征,应该抛弃同时打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帜,得到了省委的同意。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代表中国湖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说:“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既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即坚决地树立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在红旗的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②于是,中国共产党在9月的秋收起义时举起了用一块红布制作、缝着五角星与镰刀斧头的工农革命军军旗。自此以后,军旗、党旗的式样虽有变动,但红旗始终是象征中国革命的唯一旗帜。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引军井冈山并创立了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1928年朱毛会师井冈山,并把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党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以“红色政权”指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政权,此后,革命根据地由于旗帜的颜色也被称为“红区”,与国民党

统治区的“白区”相对。随着根据政权建设的巩固,中国共产党开始在红区开始了全面“赤化”的过程,在红区里出现的各种新事物常以“红色”命名,如红色歌谣、红色戏剧、红色舞蹈、红色医院、红色学校等。中央苏区还创办了红色刊物,以报纸和杂志作为红色文化宣传的喉舌,如《红色中华》《红星》。其中《红色中华》辟有“红角”“赤焰”“红色小辞典”“赤色战士”“红色区域建设”等彰显红色特征的栏目。红区还在每年的5月开展“红五月运动”,以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红军长征初期中央机关的两个编队分别取名以“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仍可真切地感受到一幅幅红旗漫卷西风的画卷。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军队改编伊始,红军官兵要摘下红军帽时,许多人感情上难以接受,“红色”向“白色”的转换引起士兵情感上的抵触,足见红色文化已渗入广大官兵的心灵深处。

中国革命的“红色”叙事隐喻,主要有三重:其一,暗合了红色自古被赋予的驱邪逐恶功效,而近代中国革命对象恰是极具侵略性、贪婪性的资本—帝国主义,以及带有凶神恶煞嘴脸的国内反动力量。其次,红色象征着投身革命熔炉的革命者,以一念之诚满怀对于革命理想的一颗赤子之心,以一腔热血恪守忠于信仰的奋斗精神。“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格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③其三,红色也预示着革命是一个血与火的洗礼、淬炼历程,革命者在布满了荆棘和困厄的征途中抛头颅洒热血,以血染的风采浸红了共和国的旗帜。

二、红色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核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红色文化的概念、核心与本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成果可观^④。综汇和分析多家观点,我们认为红色文化应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红色文化包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和建设时期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贯通。狭义的红色文化就是红色革命文化。本文主要是在狭义理解的基础上探讨红色文化的。

红色文化的原点、核心是革命文化,举凡抗战文

化、解放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等,皆与之相会通、互渗、交叠。革命遗址、革命建筑、革命陵园、革命展馆、革命武器、革命服饰、革命徽章等“器物文化”作为唤起革命意识、发扬革命精神的手段和载体,为我们追寻、再现革命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这些作为承载红色文化的外在符号而存在,不能直接反映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同时,那种认为红色文化包含所谓红色“制度文化”的看法,或者认为红色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观点,易导致红色文化概念的泛化和红色文化研究的“程式化”。有学者认为红色文化的精髓就是红色精神或革命精神,并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列举法来指代、呈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但对于整体意义上的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仍不甚明了。我们认为,准确把握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方能将红色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依循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科学的本质主义理路,从超越具象的层面观照其整体性,哲学地把握其共通的品性、特质、意蕴和风貌,才能揭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

具体而言,红色文化的精神源流可上溯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所力行的救亡文化和革命文化,更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五四新文化融会,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贯通,下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在四个紧密依存而又各有侧重的面向: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

(一)革命理想主义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崇高追求,这一“初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也是红色文化得以孕育并不断成长的精神之源。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⑤也正是秉持这一初心,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革命者方会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方才有“高于天”的精神维度。

革命理想主义之大本大源,“建立在对马克思主

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理解之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⑥这两个制高点,内在地决定了源自革命理想主义的红色文化的精神维度。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之时,革命、革命党、革命文化已不是新生事物,为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才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说到底要归于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革命组织,虽满怀革命热情,但终因思想混乱、组织不纯而归于解散。而改组之后的国民党也在孙中山逝世以后背离“三民主义”的革命宗旨,与人民大众渐行渐远,终被人民所抛弃。所以说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不懈追求,矢志不渝,前仆后继,才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党,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严峻的形势下,并非没有人动摇、退缩,然而,那些在白色恐怖中顽强生存下来并突出重围的革命者,凭着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决心重新站起来,掩埋同伴的尸首,揩去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这才有了全国各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有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那里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撒下了红色文化的种子——井冈山精神。

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是井冈山军民一切革命力量的源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先后遭受“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之后,红军和群众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对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之原因及条件的条分缕析,拨开了笼罩在根据地军民中的迷雾,不仅极大地坚定了井冈山军民革命到底的信念,而且给这一信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使他们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理想信念化为具体革命行动。后来,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够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打破敌人的数次军事“围剿”、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长征之所以成为“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

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之所以赢得民心建立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政权,“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著,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二)革命英雄主义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历史上不乏为民请命、忠君爱国的忠臣良将,不乏开疆拓土、收复失地的英雄豪杰,也不乏浩气文胆、慷慨悲歌的凛然之士。他们从不同侧面昭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主要体现在“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等。

革命英雄主义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优良基因,在革命年代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对此,毛泽东有过明确的论述:“这个军队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②

革命英雄主义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重述的这些革命英烈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革命英雄主义者勇于战斗、敢于牺牲的浩然之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韧意志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凌云壮志,而这一切,都源自对于其所投身的革命事业的坚贞。

革命英雄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前者坚实地立于唯物史观及群众史观之上,后者则来自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其次,二者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关系上截然不同。朱德指出:“革命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而忧,以革命之乐而乐,赤胆忠心,终生为革命战争事业奋斗,而不斤斤于作个人打算,为

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③

这也表明,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是不掺杂质、不含水分、不怀私心、不计私利的,是一种舍弃“小我”以保全“大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浩气长存的纯然英雄气概,是红色革命文化中最摄人魂魄、感天动地的纯粹精神品质。

(三)革命乐观主义

在艰窘困厄的革命历程中,革命乐观主义往往体现为革命英雄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但其所洋溢的自信达观和超迈豪放,所展现的不惧艰难和不惧险阻,所传递的“一不怕苦”和乐于吃苦,所践行的苦行主义或艰苦奋斗精神,绘就了一幅史诗般瑰丽的革命长卷,生动而鲜活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敢于担当、坚韧不拔的内在禀赋,成为滋养红色文化盎然生机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渊藪。

革命乐观主义体现为革命者在逆境下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马克思说过:“如果斗争只是在极为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的进行的,无论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文化条件都远不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提,革命事业的艰难困苦程度也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就物资匮乏而言,缺衣少被、缺粮少食、缺医少药、缺枪少炮几成革命时期的常态。长征途中,红军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渡过大江急流的生命禁区,冲过重重的敌军封锁线,然而却时常只能靠挖野菜、吃树皮充饥。延安时期,不少军队在“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⑤的情况下,坚持了八年的敌后抗战,面对严酷的经济形势,根据地发起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军民大规模开展生产自给运动,三五九旅开发的“陕北的好江南”正是发扬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的典范。根据地没有基本的医药,就上山采集草药,没有手术刀就用竹片和剃头刀替代,没有纱布就用白棉布替代,没有武器弹药就自办兵工厂,用简陋的工具制造土枪、土雷。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党领导的人民和军队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抱定必胜信念,渡过了一

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革命乐观主义对艰难险阻的无惧和超越,源自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远见卓识而对革命前途持有正面看法的观念。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⑩革命年代,物质资料的匮乏已是极度困难,更遑论精神文化生活了,然而,凭借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革命期间根据地的文化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革命官兵苦中作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学习的结合,提高了知识水平,也激发了民众投身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这里,革命乐观主义成为抵御逆境的一大法宝。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的邹韬奋尚言,“工作愈伟大,所受的反抗也愈厉害,简直成为一种律令,对付这种厉害的反抗,最重要的工具是乐观主义”。^⑪

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内核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我们党正是凭着艰苦奋斗精神,凝聚起党心军心民心,使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力量,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可以说,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从井冈山上点起的革命星火到长征途中生死与共的炼狱,再到延安时期的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一贯的作风,是党和军队的根本立足点,是红色文化之为“红色”的极好印证。

(四)革命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完成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伟大力量源泉。无产阶级在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不屈斗争中,正是依靠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才使自己本阶级及其先锋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英勇顽强,表现了任何反动势力都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尤其是在革命事业暂时处于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集体主义给人们战胜困难以无比的勇气、信心和力量。正因为如此,集体主义构成了红色文化的革命精神内核。

革命集体主义基于我们党的人民立场。“人民立

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⑫革命者正是坚信献身的事业是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会在革命征途在不计“小我”的名利、得失,“小我”与“大我”在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革命的集体主义从而进入崇高的道德境界。

革命集体主义集中表现为革命者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多块红色根据地,在抗战时期创建了19块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形成的同时,有些地方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狭隘的山头主义。延安整风运动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三大内容之一,正是因为革命队伍中突出存在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等山头主义倾向。毛泽东在1942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提出:“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还号召全党同志要顾全大局、严守纪律,“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有效地制止和克服了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分散主义,确保党内政治生态健康发展,确保全党全军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指挥下行动。

革命集体主义还体现为抱团取暖、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团队精神。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历来重视并保持命运共同体的团队精神,并在长期军事实践中形成了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优良传统,以主人翁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自觉服从服务于大局,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赋予的艰巨任务。可以说,紧密团结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军事“软实力”的核心和灵魂。在革命年代,置身于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时间之长、条件之差、战况之烈,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与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自为政、内讧不断等乱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人民军

队内部官兵平等、上下齐心、抱团取暖。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方能胜利。正是靠着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团队精神,人民军队才能凝聚起磅礴之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革命集体主义更体现为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数仁人志士把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当作其人生至高无上的志业而上下求索。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天下为公”,激励着他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们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不息。无私奉献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变的主题和本色,是共产党人人生观、价值观和名利观的具体体现和永恒追求,是无数革命先烈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共产党人在锻造红色文化的革命实践中淬炼出的崇高品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伟大胜利的力量源泉。95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靠的正是任何时代、任何政党中都无法找出的无数个光明磊落、廉洁奉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先进分子。

三、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文化乃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行之有效的创造。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就是人的社会价值,是人的力量的显现。广义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孕育并创造的一笔富有丰赡内涵和社会价值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的力量转化为足以创造史诗般人间奇迹的伟力,显现出莫大的正能量和软实力。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至今生机盎然。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魅力,是极具当代价值的文化。在历史新起点上,红色文化在增进政治认同、凝聚各方共识,增强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倡扬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在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愈益凸显出重大战略意义。

(一) 增进政治认同

人类政治认同的前提,是政治情感认同、政治价

值认同、政治理论认同和政治制度认同,在此前提条件或基础上,方形成对于现行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度、忠诚度。当前中国的政治认同,集中体现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行政治体系和治理模式的认知、判断、认可、服从和参与度。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软实力较量和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价值交锋日趋激烈,西方把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实施“价值渗透”“颜色革命”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主要战场,企图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影响、误导国人的政治认同和价值选择,戕害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国内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从历史观、方法论到具体研究,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话语予以全盘否定,在“理性反思”“重新评价”“还原真相”“范式转换”中表达政治诉求。他们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脊梁,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爱国英烈和革命英雄大泼脏水,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一味抹黑。这一思潮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基,诋毁、消解红色文化,对国人的历史认知、政治认同产生了严重误导。

“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会以非凡的活力永久存在下去。在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会把他们的一些爱投向支持这个制度的各种象征:共同的名称、共同的英雄、共同的使命、共同的需要。”^①红色文化不仅涵盖了革命历程中形成的共同的精神内涵,而且铭记和传颂着20世纪中国共同的民族英雄,因而具有精神感召的力量,是克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把利器。

红色文化的孕育形成史与党的奋斗发展史具有共时性。对红色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也就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重温党的奋斗发展史,有助于坚定对于党的历史的自信,深化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历史根基的认识。红色文化以一种生动鲜活的方式叙说历史,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历史和人民是为什么和怎么样选择了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因而有助于形成自觉拥护党的领导地位的意识。

以革命理想主义为其精神内核的红色文化生动地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境界,革命先烈们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事迹使党的光辉形象巍峨而高大。无论身属何种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只要不以历史虚无主义的认知去刻意消解或抹杀这段历史,就能从革命者身上体会到一种崇高,感受到一种震撼,从这个意义上讲,红色文化无形中起到调节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的作用,是新形势下对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质育人资源。

总之,发挥红色文化特有的精神感召、价值引领和文化渗透的作用,以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增进政治认同,维护当今中国的文化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

(二)增强文化自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其语境之庄严,观点之鲜明,态度之坚决,底气之充沛,传递出这既是文化理念又是指导思想。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所禀赋和拥有的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所持有的坚定的信心和发展的希望。简而言之,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深刻把握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予以充分肯定,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抱有坚定信念。

那么,我们提倡的“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源自何处?有没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现实依据?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在这里,习近平同志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列起来,把它们共同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就是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仅来源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时期形成的

红色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先进文化同样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深厚土壤。

诚然,每一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观都有其传统文化的渊源和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这也是我们民族自信的总源头,是我们战胜风险挑战、开创美好未来的精神动力和自信源泉。我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文化自信。

我们的文化自信,还源自我们拥有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或红色文化。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脱胎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在新形势下不断进行着再生再造、凝聚升华,从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代中国的历史业已证明,仅仅依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无法在列强环伺的现代社会维护国家生存和民族独立,更无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近百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它靠的是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红色文化。同理,21世纪的中华民族阔步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未来,则主要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但这三个文化是一脉相承、共生共荣的,也是相得益彰、不可偏废的。因此,“在文化自信中,我们既要重视传统文化,又要重视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文化传承问题上,我们决不要忘记两个传统。一个是不能忘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也不能忘记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革命传统。革命传统就是红色文化的传统”。“如果抛弃两个传统,数典忘祖,或忘记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时期先进人物的出现,无法理解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呈现出的勃勃生机。”^⑤所以,对于5000年文化传统我们要珍视,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形成的新的文化遗产即红色革命文化,我们同样需要珍视。在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我

们既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又要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更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实现我们增强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

(三)建设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社会主义“四有”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基础上建立,立足于中国实际,吸收国外文化有益成果,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形成和发展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代表时代进步潮流和历史发展要求,在多样化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思潮中居于主导地位。

红色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的结晶,孕育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因,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从红色文化的源头汲取活水。

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中国的文化纲领,即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两年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毛泽东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成为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讲话》指引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洪流,推动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不断走向发展繁荣。历史充分表明,《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一路走来,是一条不断延伸和拓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文化创造。我们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已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有活力和生命力的文化,是一种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文化。这也同样充分说明,红色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是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文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传承下去、传播开来。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红色文化是滋养、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当今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底气之所在。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应紧扣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总命题和中国文化建设的新课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最后落脚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来。为此,我们要提升对于红色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彰显其对于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增强对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自主能力,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认为,这种文化自觉是对于红色文化的渊源、发展、未来以及作用和地位等有清醒认识和自知之明,并主动承担起红色文化在现时代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在这里,文化自信并不是文化自傲,文化自觉也绝非妄自菲薄。

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提升红色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还要秉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精神,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将其纳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工程之中,将其“融于教、涵于制、载于文、化于境、行于众”^⑧,内化为人民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为此,当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有力地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扰。同时,因地制宜地发掘、整理、开发、转化和利用好各地积淀的独特的红色

资源,把潜在红色资源转化为显性的育人资源,把分散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整体的育人资源,把历史的红色资源转化为现实的育人资源,从而形成包括理论研究成果、党性教育成果、思政课教学成果、艺术创作成果、文化传播成果和实践教育成果等在内的一系列红色文化育人成果,注重用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和国史上的革命人物、英勇事迹、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等感染、启发、教育、引导人们,使学习红色历史与坚定信念相结合,学党史知党情与跟党走相结合,开发资源与以文化人相结合,以体现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传承与弘扬、文化与育人的有机统一。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新长征路上,需要理想之光和信念之灯的指引,需要红色文化作为战胜风险挑战、开创美好未来的重要自信源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文化,完全能够为我们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注释:

①周林洁:《中国人对红色认知的文化探源》,《社会》2000年第3期,第39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2页。

③刘润为:《红色文化中国人的精神脊梁》,《红旗文稿》2013年第18期,第4~9页。

④邓显超:《十年来国内红色文化概念研究述评》,《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29~39页。

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⑨《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⑪《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⑫《韬奋文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0页。

⑬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⑭[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8页。

⑮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3日第013版。

⑯沈壮海:《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逻辑》,《人民日报》2016年9月21日。

The Core Spirit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Red Culture

Luo Yongkuan Li Yan

Abstract: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origin and source of Chinese "Red Revolution" and reveals its metaphor based on the overall grasp of Chinese revolution history led by CCP. The limited sense of Red Culture means 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 It traces to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lso Salvation Culture and Revolution Culture of recent times, combines with May 4th New Culture after Maxism's spreading in China, linked up with New Democracy Culture and followed by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Red Culture is uprearing determined ideality, promoting political identity, enhan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hel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Red Culture; China Revolution; Core Spirit; Contemporary Value